

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李晓晨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91)

[摘要]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面对自然灾害,传教士采取多种方式救助灾民,取得了一定成效。传教士在本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正因为一些传教士过分注重赈济事业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传教政策,故而弱化了教会赈济事业的慈善色彩。

[关键词]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自然灾害;赈济

[作者简介]李晓晨(1970—),女,山东省汶上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宗教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1-0079-05 **[收稿日期]**2008-11-15

近代以来,西方大批天主教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在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他们深入各地设立教区,建筑教堂,传播教义,希冀劝化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与此同时,他们也兴办了慈善事业,赈济自然灾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学术界的研究多着眼于基督新教兴办的慈善事业上,对于天主教会的慈善事业则缺乏系统分析和探讨。本文以近代直隶地区为例,对天主教传教士赈济自然灾害的缘起、概况及社会功效等作一简单论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传教士对水旱等灾荒的赈济

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据李文海等人所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附录《中国近代灾荒年表》统计,1840—1949年间,直隶地区只有九年没有灾荒记录,其他年份中每年都有一种或多种灾害。清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旱灾,直隶灾区极广,仅河间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1](P93)}。民国以后,直隶各地更是连年灾害。1920年,直隶、山西、山东等地旱灾严重,仅山东北部、直隶南部及山西一部被灾人口就约一千五百万^[2]。面对千百万灾民,政府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为此,自助义赈活动和义赈团体在社会上纷纷兴起。天主教传教士亦加入赈灾救荒的行列。

其实,早在教会成立初期,传教士就曾从事过零星的赈灾救荒活动。在清光绪二至五年(1876—1879)的“丁戊奇荒”中,传教士的赈灾救荒活动开始趋于组织化。当时,天主教各修会先后派到灾区

的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三十余人^{[3](P268)}。清光绪四年(1878年)一月,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在此组织援助下,直隶西南代牧区主教戴济世派遣神父谢儒略为本区灾民发放了很多救济物资^{[4](P83-84)}。1921年11月,北京及各地华洋义赈团体成立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作为中国常设性救灾机关。在华洋义赈会的组织与协调下,教会的赈灾事业日趋发展。从相关资料看,直隶天主教会对自然灾害的救济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筹募款物,赈济灾民

筹款捐物是教会救济灾民的主要措施之一。各地教会首先从传教经费中拨出一批款项救济灾民,有时是设立粥厂,开仓放粮。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察哈尔地区大荒,中蒙古代牧区主教巴耆贤“借过五万法郎从事救济灾民的工作。在南壕甄(今尚义镇),教士们在一个月内发放过二百袋麦子”^{[5](P91)}。1917年,直隶水灾,正定“文大司牧(文贵宾——引者)动用该堂基本金以恤灾黎”^[6]。1920年,华北旱灾,保定教区代理主教满德始“特在传教用费项下,以三成拨归赈济灾民。在外堂设立粥厂数处,收容男女难民数万余名”^[7]。各地教会除动用传教经费外,传教士还以个人名义捐款、捐物,并劝诫教徒积极捐助。1918年,永平修道院二十余名修道生“将每日所食麦面换为玉(米)面,以每月所省京钱二百余吊充作赈款”^[8]。1920年,沧县贾司铎向教民之殷实者筹款七百余元购备麦种,

分散沧南无力播种之贫户^[9]。

2. 呼吁国内外慈善机关救助灾民,担当灾区赈济专员

天主教会鉴于自身力量薄弱,无法救助众多灾民,只有向国内外慈善机关呼吁,号召全社会共同救灾。1920年,直隶北部代牧区助理主教文贵宾因直、鲁、豫三省旱灾遍地,“特来津与义赈会接洽,建议拯救方法。又函致上海仁济善堂孙仲英先生,以为灾民请命。”^[10]庆云、大名、盐山、丰润等地天主教司铎亦纷纷把本地灾情登诸报端,呼吁各慈善机关紧急救助。

在教士的呼吁与倡导下,国内外慈善机关和个人积极响应,迅速调拨大批钱款和物资运抵灾区。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慨允捐助金币五万丽耳(与法郎同价)”^[2],以救助1920年华北灾民。鉴于传教士具有丰富的赈灾经验和救灾热情,华洋义赈会等慈善机关多任用教士为赈灾专员,负责向灾民分发救灾物资。1917—1918年,直隶水灾,红十字会与上海济生会多次委托天津汤、杨二位司铎放赈。所查灾民状况,皆由汤司铎拍照。汤、杨二位司铎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获得社会人士认可。时任赈灾督办处督办熊希龄云:“教会此次办理放赈之事极善,可惜为数不过数万耳。水灾之初起时,余已与各教会通函,请出帮忙,然亦有置之不理者,可惜!可惜!若公教人均肯出来帮忙,不仅灾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11]从熊希龄的谈话中可知,在1917年华北水灾之初,天主教会与社会各界慈善机构的合作还不十分密切,以至有些教士对熊希龄督办的请求“置之不理”。及至1920年华北大旱灾时,国内外各慈善机构与团体日趋联合。11月,成立“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统一办理宣传、联络、采粮运粮、卫生防疫及对部分赈款统一分配。在这种形势下,教会的救灾活动也纳入到全国抗灾救荒之中,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被慈善机关委任为赈济专员,到各灾区发放赈灾物质。

3. 设立灾民学校,收养灾民幼童,采取养教兼施原则

在历次大的自然灾害中,命运最惨的莫过于灾民的幼小孩子。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绝望时往往卖儿鬻女,有时甚至将婴儿遗弃或杀害。1920年,华北旱灾,各地“鬻儿之风日甚一日,男孩每名二元,竟有不索值而给与人者”^[12]，“年十四五岁之女郎,价值不过三四元,尚无人过问”^[2]。顺德(今邢台)一妇人“因饥饿难忍,致将幼子煮而食之”^[13]。面对处境悲惨的灾民子女,传教士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予

以救助:一是设立贫儿收养所,专门收养孤苦无告之幼男弱女,就地养育。1920年,直隶旱灾,天津代牧区代理主教文贵宾将堂内基金拨出一点五万元,特嘱托沧县、盐山、南皮、庆云四县传教司铎收集稚弱无靠之孩童,计共九百五十余名^[9]。柏乡贾庄天主堂孟司铎自1920年入秋以来,已收养婴儿二百余名。又在柏乡、临城、隆平、唐山、任县等地村庄设立贫儿收养所十七处,收养孤儿共四百名,分派男女先生二十人,教以注音字母、算法、女红等事^[14]。二是设立灾民学校,教内外灾民儿童均可入学,学校免费供给食宿。直隶东南代牧区西南境1921年共建立灾民学校二百三十五处,学生五千零六十五人,男女教员三百六十九人^[15]。其他教区情况亦然。

4. 修堤筑坝,治理水患

对于频繁肆虐的水灾而言,散赈、放赈只是治表之法,而修堤筑坝、开凿渠道才是根治水患的治本之策。有鉴于此,一些传教士在对灾民施赈的同时,亦引导其治理水患。如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水灾过后,南壕埕的传教士曾用以工代赈办法,雇用灾民种植树木,还雇用许多人修筑堤坝、开凿渠道、筑造围堡、改良土地等^{[5](P92)},起到了良好地防洪、抗洪效果。宁津范家庄司铎白世珍于1917年洪水来临之际,亲率数百人抢修该地沙河河堤,使得“高田嘉禾,得以丰收”^[16]。1936年,西湾子代牧区高家营子村(今崇礼县高家营镇)传教士在水灾过后,提倡与村民合资,在河漕两岸修筑两道石坝,以预防将来的水患^{[5](P94)}。传教士倡导的标本兼治的治理水患措施,确实减少了水灾的发生,保护了乡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传教士赈灾救荒的动因

1. 基于慈善、博爱之心救灾

仁爱、慈善之心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基督教宣扬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17](P1542)}这里提到的近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乡亲,而是特指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基督教不仅提出爱近人,而且要求教徒爱罪人、爱仇敌。基督宗教所倡导的爱兄弟、爱邻人、爱仇敌的博爱思想,是一种普遍的爱、无条件的爱,它需要人的慷慨、怜悯、慈悲、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博爱是基督宗教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传教士正是基于人类所具有的仁爱慈悲之心,本着基督宗教的博爱精神,积极救灾,赈济难民。

在直隶各地救灾过程中,一些传教士不辞劳苦,

热诚救赈,有的积劳成疾,有的甚至牺牲性命。1918年春,直隶南境瘟疫盛行,正定府尤甚。“教堂内之神父、修士等不避性命之危,专为拯救教内外人之身神,以故染疫而死者有二位传教士、一位贞姆及一位在会之依理满(外籍修士)外,尚有三十余修道士,全是甘愿拯救染疫之人而抛弃自己之性命者。”天主教士这种“甘欲牺牲生命为救吾中国人之热忱”^[18],大大彰显了基督宗教的博爱、慈善精神,这种普世的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泛爱。

2. 传教士借助赈灾救荒等慈善事业,树立教会新形象

中国近代天主教会是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而迅速扩张和发展起来的。在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天主教会强力向直隶内地推进,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一些传教士依靠治外法权干预地方政务、介民间词讼,造成很多民教矛盾,引发了一系列教案。仅《教务教案档》和《清末教案》统计,从清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60—1898)底,直隶乡村共发生教士或外国领事、公使干预,由中国政府处理的教案八十五起^{[19](P58)}。天主教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侵略的色彩。教会、教士作为“列强侵犯中国之唯一的具体代表物”^{[20](P79)},成为义和团攻击的直接目标。而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政界的一场反教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以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相号召,势必会波及到天主教、基督教。面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一些明智的传教士逐渐认识到依靠强权传教的弊端。他们认为,只有拉大教会与列强的距离,摆脱教会殖民主义的形象,才能应对中国人民对教会的抵制与反对。为了树立教会新形象,一些传教士逐步改变令人诟病的诉讼传教方式,采取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传教政策。慈善事业传教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传教方式。罗马教皇比约十一世在对传教士的训词中说:“让我来提醒你们我在另一个机会所讲过的话,那就是,凡是关怀居民身体健康的,救济贫病的,对婴孩和儿童慈爱的,都会获得当地人士的好感和爱戴,因为仁爱和慈善是最易感动人心的。”^{[21](P1370)}

在教皇鼓励下,直隶各地传教士把扩大慈善事业作为改变教会形象的一个重要步骤。为此,各地传教士及教徒以极大精力和热情投入到赈灾救荒的行列。他们改变原来零星、自发的救灾方式,有目的的组织起来,并与国内外救灾团体协同合作,共同救灾。同时,他们利用教会兴办的一些报刊登载教会救灾成绩及一些教士、教徒救灾事迹等,制造舆论,

扩大教会影响,以树立教会热心赈灾、关注灾民的新形象。

3. 传教士利用赈灾之机传教,希望皈依大批灾民

传教士传教的终极目的是救赎人类灵魂,使更多人皈依天主教。为此,“他们在从事社会事业的时候,当然寻求传教的机会”^{[5](P18)}。这样一来,赈灾救荒等慈善事业理所当然成为传教士一种重要的辅助传教方式。罗马教廷驻中国宗座代表刚恒毅指出:“福传最有效的方法有三:学校、刊物和慈善事业。”^{[22](P268)}长期在直隶地区传教的法籍神父孟爱理认为:“慈善事业对传教事业有很大帮助,这是间接的讲道,能触动教外人的心。”^{[4](P160)}基于这种认识,天主教士在进行赈灾救荒的同时,无不抱有吸引灾民皈依天主教的实用主义宗教动机。

赈灾传教作为教会一种简便、高效的传教方式,在直隶各教区得到广泛应用,献县教区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清宣统元年(1909年),献县旱灾,传教士以各种方式对灾民实行赈济,“但前提是必须研究教义并学习必要的经文”^{[23](P154)}。1918年,直隶水灾,献县教会对难民施粥,“每次(难民)吃粥前先有十分钟的要理讲授。”^{[23](P165)}尽管赈灾传教简便、高效,但也存在很大弊端。由于灾荒年时领洗太快,许多人在灾荒过后便不承认自己是教徒。据献县教区档案记录,清同治四年(1865年),13164名教徒中有301人不愿承认是教徒;清同治五年(1866年),14162名教徒中有297人不愿承认是教徒;清光绪五年(1879年),26125名教徒中有1601人不愿承认是教徒;清光绪六年(1880年),29105名教徒中有1879人不愿承认是教徒;清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901—1902),47132名教徒中有6036人不愿承认是教徒^{[23](P102)}。鉴于不少人在得到教会救济后就不再研究教义,更不肯领洗入教的情况,献县教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规定:接受教会赈济者须表示接受信仰并交出财产抵押卷,开始读教理时可领钱三吊,领洗时再领钱二吊,中途不肯入教者须交还赈济款并领回财产抵押卷^{[23](P155)}。从献县天主教会的上述规定看,传教士确实把赈灾作为一种传教方式,他们在确保灾民研究教理并进而入教的前提下,始对灾民予以赈济。

三、传教士赈灾救荒的社会效果

1. 挽救了大批灾民的性命,教养了许多灾民幼童

传教士赈济事业最直接、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救

济了大批濒于死亡边缘的灾民,挽救了他们的性命。面对无衣无食的灾民,传教士施粥放粮,使大批灾民得以活命。武邑县孟司铎在1921年荒灾中,采办了六百二十七吨高粱亲自散放到三百二十个村落中,叨其惠者计一点二万家,居民借保余生者达十之六七^[24]。

与救助成人灾民相比,传教士更重视对儿童的救助。这除了因缘于灾区儿童的悲惨处境外,还因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因今日多救一孩,即他日多一家人民”^[15]。在传教士的救助下,许多幼童得以存活。献县教区在1920年旱灾中即抚养二万多名儿童^{[23](P183)}。在挽救这些弱男幼女性命的同时,教士对灾民儿童还进行教育,使其“勿虚掷光阴,不染恶习,致将来有败毁家业之结果,诚为一种慈善之事迹也”^[15]。

2. 教会形象有所改变,缓和了教会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矛盾

直隶地区天主教士的赈灾救荒事业对于改变教会殖民侵略形象确实有效。一些教士所表现出的慷慨、慈爱、不辞劳苦、不怕牺牲的精神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好评,缓和了教会与中国社会的矛盾。1918年春,正定教区为救治瘟疫病人而牺牲的教士、修女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赈灾督办熊希龄、直隶省议会、天津红十字会等均致电主教文贵宾,高度赞扬教士、修女的甘愿牺牲精神。“11月7日,徐(世昌)大总统特下令给予文主教若望以二等嘉禾章一枚。”^[25]一些在灾荒中担任赈济专员的传教士因查勘详密、公平正直,亦获得灾民普遍肯定。1921年6月,庆云县灾民专门致函天津《益世报》,对1920年华洋义赈会委托放赈的杨、斐、徐三位司铎高度赞扬,称他们“散放有方,手续详明,按灾情之重轻,定施放之先后。食赈之户,分为极贫、次贫,大公为怀,无论教民、平民,奸人不得欺蒙,平民皆得实惠。而且涓滴归公,无丝毫妄费,所任在堂各员,只用菽粟充饥,又皆勤劳耐苦,实为难得”^[26]。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灾民对放赈司铎的赞誉。一些官商绅董还代表灾民向热心救灾的传教士送匾额、万民伞等物,以表彰教士的赈灾功劳。武邑县孟司铎1921年即收到匾额六方、国旗二面、万民伞一顶^[24]。

上述教士博爱为怀、热心赈灾的事迹,与以往教士依靠强权、仗势欺人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助于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深入了解,从而缓解了近代以来教会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减少了民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天主教会也进一步融入到

中国社会中。

3. 大批灾民入教,促进了教会教务的发展

由于传教士一直把赈灾等慈善事业作为辅助传教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们在救济灾民时总是不失时机地宣讲天主教教理,传播教义,并采取分发救济粮、给予钱款等物质刺激的手段吸引灾民入教。在教会的严格要求下,许多灾民出于活命的需要,只好以入教为条件,换取教会的赈济。如1917—1918年直隶大水灾中,直隶东南代牧区有七百名灾民领洗入教^{[23](P168)}。文安辛庄村亦有许多灾民借机入教,至1918年,辛庄村约有80%的村民入教^{[27](P108)}。直隶西南代牧区在1920年旱灾中也吸收不少灾民入教。阜平第一批新领洗的教徒有三百人,井陘、平山、元氏、临城、沙河等地同样增加了望教者的数目^{[4](P138)}。景县自1936年大水灾后,一直民不聊生。为了救济灾民,主教凌安澜要了大批救济物资,凡信仰天主教的穷教徒和愿意入教的穷人,每人每天一斤红高粱,一时欲进教者甚多。东朱河教堂附近村庄欲信教者达数百人。1940年6月,三百余人同时领洗入教^{[28](P147-148)}。上述为求教会赈济而入教的灾民,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内心信仰天主而奉教,而是在生存危机面前不得已的选择,是典型的世俗功利动机。尽管大批灾民抱着实用功利目的而入教,但经过长时间对天主教教义的学习与理解,有些人后来诚心皈依天主教。从这个意义上说,灾民入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会教务的发展。

尽管近代直隶天主教会实行的救灾政策和措施救助了大批濒临绝境的灾民与儿童,但我们在对教会的赈灾慈善事业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应正视教会利用赈灾进行传教活动的弊端。就传教士而言,他们的目的是利用一切机会传播福音、发展教徒。只要教士不采取强制入教的手段,其传教行为应无可厚非。然而,个别传教士和教会的做法确实有违灾民意愿。前文所述献县教区对灾民赈济的严格规定即带有强制色彩。因此,灾荒时期许多灾民并非出于宗教信仰动机而入教,乃是在教会强制规定面前世俗功利目的使然。许多人在荒年过后渐渐退出天主教会即是最好的明证。正是教会急功近利甚至强制的传教政策,使教会赈灾慈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灾荒时期大批灾民入教的事实也给人们留下天主教民多为“吃教者”的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教会形象。传教士片面追求教民数量的赈灾传教手段虽可一时奏效,可从长远看却是一种短视行为,对教会的发展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1]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2]近事.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福建浙江七省大荒灾汇志[J].圣教杂志,1920(10).
- [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4]A. Morelli. Notes D'Histoire Sur le Vicariat de Teheng - Ting - Fou 1858 - 1933[M]. Pei - Ping, 1934.
- [5]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M].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
- [6]悲时.时评[N].天津益世报,1919-07-16.
- [7]顺直新闻.保定满主教热心振(赈)济[N].天津益世报,1921-01-25.
- [8]本埠新闻.永平修道生减食助赈[N].天津益世报,1920-11-19.
- [9]本埠新闻.主教司铎之热心振(赈)济[N].天津益世报,1920-10-16.
- [10]本埠新闻.文主教为灾民呼吁[N].天津益世报,1920-09-13.
- [11]近事.本国之部·直隶[J].圣教杂志,1918(8).
- [12]本埠新闻.大名教士报告灾况[N].天津益世报,1920-10-10.
- [13]本埠新闻.顺德灾妇食子之惨剧[N].天津益世报,1921-01-14.
- [14]本埠新闻.柏乡公教司铎之慈善[N].天津益世报,1920-11-16.
- [15]近事.天主教会赈济灾黎汇志[J].圣教杂志,1921(4).
- [16]顺直新闻.宁晋绅民感颂公教司铎[N].天津益世报,1921-03-13.
- [17]圣经·玛窦福音[M].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1992.
- [18]近事.本国之部·直隶[J].圣教杂志,1918(7).
- [19]李晓晨.近代直隶(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1840—1949)[D].天津:南开大学,2007.
- [20]路遥.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 [21]B. F. Meyer. M. M. 乡村传教的步骤[A].传教夜谭[M].上海: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1950.
- [22]刘嘉祥.刚恒毅枢机回忆录[M].台北:天主教主徒会,1992.
- [23]刘献堂.献县教区简史——庆祝教区成立150周年[M].台湾,2006.
- [24]近事.直隶武邑县孟司铎之仁风[J].圣教杂志,1921(12).
- [25]近事.本国之部·直隶[J].圣教杂志,1918(12).
- [26]顺直新闻.庆云县灾民之感激语[N].天津益世报,1921-06-02.
- [27]井桂林,武振魁.辛庄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安县委员会.文安文史资料:第3辑[Z].1994.
- [28]范文兴.天主教景县天主堂史话[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景县委员会.景县文史资料:第2辑[Z].1989.

The Relief of Natural Disasters from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Hebei Province in Modern Times

LI Xiao - ch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re were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in Hebei province. Missionaries adopted various ways to relieve them. When they had relief work with the desires of love and beneficence, they also had some kind of practical motivation such as changing the image of churches, attracting people into their religion and so on. Some missionaries took measures of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 thus weakening the beneficence while relieving natural disasters.

Key Words: Hebei Province in modern times; Catholic missionaries; natural disasters; relief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

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作者: 李晓晨, LI Xiao-chen
作者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刊名: 河北学刊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EBEI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09, ""(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8条)

1. 李文海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1994
2. 近事 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福建浙江七省大荒灾汇志 1920(10)
3.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2004
4. A Morelli Notes D Histoire Sur le Vicariat de Teheng-Ting-Fou 1858-1933 1934
5. 王守礼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1947
6. 悲时 时评 1919
7. 顺直新闻 保定满主教热心振(赈)济 1921
8. 本埠新闻 永平修道生减食助赈 1920
9. 本埠新闻 主教司铎之热心振(赈)济 1920
10. 本埠新闻 文主教为灾民呼吁 1920
11. 近事 本国之部·直隶 1918(08)
12. 本埠新闻 大名教士报告灾况 1920
13. 本埠新闻 顺德灾妇食子之惨剧 1921
14. 本埠新闻 柏乡公教司铎之慈善 1920
15. 近事 天主教会赈济灾黎汇志 1921(04)
16. 顺直新闻 宁晋绅民感颂公教司铎 1921
17. 圣经·玛窦福音 1992
18. 近事 本国之部·直隶 1918(07)
19. 李晓晨 近代直隶(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1840-1949) 2007
20. 路遥 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 1990
21. B F Meyer M M 乡村传教的步骤 1950
22. 刘嘉祥 刚恒毅枢机回忆录 1992
23. 刘献堂 献县教区简史--庆祝教区成立150周年 2006
24. 近事 直隶武邑县孟司铎之仁风 1921(12)
25. 近事 本国之部·直隶 1918(12)
26. 顺直新闻 庆云县灾民之感激语 1921
27. 井桂林, 武振魁 辛庄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 1994
28. 范文兴 天主教景县天主堂史话 1989

